



海论聊斋

王蒙:作家、学者,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,曾任文化部部长。

武昌府人尹图南,另有别院房舍,租给一位秀才居住。半年多来,尹图南从来没问过此事。中国文化重视的是立德、积善、勤学、崇礼、立劝、立言、重农、自律、青史留名等等,却不重视财富——阿堵物那个玩意儿的积累,堂堂尹老爷或尹大少,正宅之外拥有别院,不是低层次糊口生民,更要彰显清高,不重房租……过去叫作“吃瓦片”收入呢。

这天九公尹图南遇见秀才。见他年纪轻轻,相貌俊雅,风姿潇洒,穿衣讲究,便上前与他交谈。秀才谈吐容色温文尔雅,令人喜欢。外表光鲜,招人喜爱——从理论上,中华文化并不强调颜值,但实际上,难免以貌取人,在一个标榜礼化文化的地区,礼不礼当然要举止进退容色脸面与身体语言,没有什么人长的是放射性透视五脏六腑眼睛,能一眼看透人品,谁能在意外表种种呢?尹图南对秀才印象深刻,回家后说给妻子听。妻子派了个丫鬟以赠送礼物为名,去悄悄看看秀才家世背景。理论上传统文化不主张妻室干政,但实际上许多妻子们信息侦察的热情与手段都是超一流的,是夫婿的情报参谋。妻子很快了解到秀才家有美女子,天仙般美貌绝伦,未说是其妻,家里花草玉石、衣服器皿,超凡脱俗,是尹家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尹图南得知后,更加纳闷,干脆亲自去造访,不巧,赶上秀才外出。第二天,秀才回拜。尹图南打开他的名帖一看,他姓余名德。尹图南打问他的家世门第,秀才回答哼哼唧唧,不愿细说。尹图南追问,秀才乃说:“您屈尊驾临寒舍,我岂敢怠慢?您知晓我不是被捉拿的盗匪,也不是逃犯,那何必过分细致地追问来历呢?”

作为房主与年龄大的一方,按说尹氏查问一下年轻房客来历,还是合理与正常的:在中国,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血亲性形成了一种村落共同体意识,各家非亲即故,世代共处一方,互通互助互知,谁不知道谁呢?再者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公共与共有意识,也即共产主义一词 communism 的拉丁语词根 communis,即中国人心目中的公有意识、社区意识,也是提倡集体主义与相互多沟通的。

尹图南连忙谢罪,蒲松龄这里,距今三百年前已经有私密(privacy)意识了,够超前的,整个

中国承认并尊重个人私密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。尹氏安排自家摆设酒宴,二人饮酒谈天,一直喝到天黑,才有两个异族肤色深重的奴仆,举灯牵马,把秀才接了回去。那时高级人家已有使用异民族仆役的习惯了。

后来秀才回请尹图南。尹图南来到他家中,见室内墙壁都有壁纸裱糊得洁净放光,和镜面一样。室中有狮子形状的金香炉,燃点着奇异不凡的香料,放出奇香。秀才的房舍装修,一个是说了壁纸,一个是说了香炉和焚香,突出了雅闲文化,相对轻视了装修与设施的实用性。壁纸壁饰壁材,显示的是对环境与审美的追求,平滑如镜,也许他们的壁纸采用了特殊材料?放光?更高级了;熏香则包含着清洁驱邪、祭祀崇拜、沟通天地、遐想沉思的氛围感受。

秀才家中,一只碧玉瓶中竖插着两支凤尾和两支孔雀翎,都有二尺多长。凤与孔雀,都是罕见禽鸟,读至此处,王蒙似乎不无“青鸟或传云外信”之感。南唐中主李璟原词是: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,所谓婉约的另一面一定是闲适与空灵。另一只水晶瓶里浸着一株似是粉色花朵的小树,不知其名,也是二尺来高。枝条倒垂,覆盖在花瓶之外,叶疏花密,含苞未放。湿润的花瓣似收起翅膀的蝴蝶,而花蕊如蝴蝶之须。

花是蝴蝶须展翅,条如垂柳且抒情。席上摆了八个菜盘,每样菜都异常华美。秀才命童子击鼓催花行酒令。鼓声一响,瓶中花儿便随鼓声而抖动,几近折断。颤悠了一会儿,蝴蝶的翅膀渐渐伸张,鼓声一停,轻响中花蒂和花须轻轻飘落,变作蝴蝶,飞落到尹图南的衣服上。此情此景此物此观赏,令人想起的是唯美的奥斯卡·王尔德,王尔德的降生是在蒲松龄后二百多年,蒲清已经触摸着清代中华的文学天花板,所写余秀才家的种种无可比拟,难以设想,说玩具是玩具的极限,说财产是财产的少有,说待客是待客的高端,说游戏是游戏的顶尖,美丽豪华天真绚丽,生气洋溢,文明满满,达到了物质美化与精神想象的极致。

秀才笑着起身,拿起大杯斟上酒让尹图南喝了。酒刚斟满的时候,蝴蝶飞走。过了一会儿,鼓声又作,有两只蝴蝶飞到余德的帽子上。

《集印为诗》是寄荃斋系列展事的发端之作,也是我从鉴赏到收藏再到创作这个“三步曲”的第一步。追根溯源,源自十年前那个完全偶然的“灵光乍现”——

2012年新年即将来临。按照我移居深圳后20多年的习惯,每到年终岁尾时节,都要赶制一批贺卡,分寄故乡亲人和各地友朋。近些年流行手机短信拜年,我也只能与时俱进随大流。不过,即便是用手机拜年,我也依然固守自创自制的旧例,不肯“挪用”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网络拜年话,多是自作一首小诗,以表辞旧迎新之意。这一年,本想依样画瓢,又觉得了无新意。迟疑之际,忽然想到刚刚收藏了几枚印章,印文颇有韵味,何不动动这些印章的脑子呢?脑子里这么一念,立马想到以制作印屏来当贺卡,既新颖又脱俗。

主意既定,我就开始挑选中意的印章,准备制作印屏了。做印屏是我刚从几位篆刻家朋友那里学会的新玩法:一张竖纸条,加盖几个印章,两旁随兴书写三两行小字,一般就是前人的诗文警句。如此一来,书法与篆刻融于一幅。很多朋友都喜欢我这种印屏形式。我本来也想用这种现成的方法制作贺卡的,可是,恰恰在写什么内容的问题上,忽然感到一丝别扭:以往都是自己作诗赠亲友,难道今年要当“文抄公”?再说,古人诗文警句跟印章无关无联,跟拜年也没啥关系,这样的新年贺卡有点不伦不类了。这么一想,我的创作热情顿时归零了。

片刻静思之后,忽如“灵光乍现”:为何不用现成的印章,做成一首小诗呢?把用以组诗的印章盖在中间,两旁以毛笔书写诗作的原文,这样的贺卡既有新意又有观赏性,岂不是两全其美?这真是一念转换,峰回路转。很快,我的第一首集印诗由此诞生——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津门长客胡不归?烟云供养逍遥乐,不看人面免低眉。”这是一首以六方闲章组合而成的言志小诗,其中第一、第四两句分别是辛弃疾和白居易的名句,中间那两句则是我用闲章印文“拼装组合”而成的。

这个特殊的“贺卡”寄出之后,立即受到亲友们异常热烈的追捧,津门好友冯骥才更是急切来电称:“上回寄来的印屏都让朋友们抢光了,你再给我寄几件来吧,这个有意思!”

朋友们的追捧,使我大受鼓舞,也使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制作新的“贺卡”。我想,总不能把那一两首诗反复制作呀,于是,就开始有意地用心琢磨这个新鲜玩法了。一方面要寻找更多的印章,积攒更多的词汇;同时也要作成更多的诗作。就在这个时候,好友陈浩铄巧来到我家串门儿,他是深圳有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,他一见我弄的这些东西,顿时兴奋起来,说你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。他回去一看,发现这种形式此前没人玩过。他比我还要兴奋,说你这是个创举呀!于是,他为我的一幅作品写了一段题跋:“集印诗为侯军兄所创,以藏印为题,信手拈来,诙谐生动,既古既今,亦友亦文,文理禅意,尽在其中矣。”就在这个题跋中,他给这个新鲜玩法定了一个名字:“集印诗”。

“贺卡季”很快就过去了,而我的集印诗创作却并未中止,反而越玩儿越上瘾

余德家的科学奇幻实验场

□王蒙

余德笑着说:“这可是自作自受了!”也喝了两大杯。第三次鼓声响起,蝴蝶乱纷纷落下,又翩翩地飞到二人的袖子和衣襟上。击鼓的童子笑着过来,用手指点着,数每人身上的花朵:尹图南应喝九杯,余德喝四杯。这时尹图南已微有醉意,不敢多喝,勉强喝了三杯,离席告辞。

前面一个开始小酌的自然段,写到鼓催花落,化蝶待客,阅读评论者当然已经五体投地,幸甚至哉,登峰造极,美胜九天,心悅五洲,顾四方而欲击节起舞;谁想得到、梦得到、文学得到?至此为止,一切不过是刚刚起步,蝴蝶指引酒事,花瓣舒展清心,蝴蝶多情招引,美酒沉醉神魂,人生不过人事,万物更得万芳万喜万诗万真万!

读者诸君,读到这里,你有没有到头感、饱满感、顶端感、登天飞升感、再无他求感、死也不宽慰!

让我们再想一想,蒲松龄描写的余德家的待客家宴游戏设备,走的是三百多年后出现的电力电子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的路子啊!其他作品中还有飞船、登月、美容手术等幻想,咱们缺少的就是一片赛先生——科学啊。

尹图南越来越感到余德是个奇人。但余德不喜欢和他人交往,他愿意的是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。村人们红白喜事,他也从不去庆祝或吊唁。独善其身,独享其乐,独谋其事,这算不算是一种个人主义、非群体主义呢?还是出自一种非群体的自危和自保意识呢?他是狐狸精?他是鬼魂?他是异类修炼而成?不说,更好。尹图南逢人就念叨余德,这是余德最不喜欢了的。听到他的奇事,都想与他结交,闹得他家宾客盈门,达官贵人。余德很不耐烦,突然辞别尹图南迁走了。却又不是不辞而别。余德走后,尹图南来到他住过的别院,庭院空空,洒扫得一尘不染。余德式的个人主义是洁癖性的?互不相扰,自行其是。燃刺的蜡烛堆放在石阶下,窗子上还剩些布帛线头,上面还看得出留下的指痕。屋后遗留下一具白石水缸,能盛下一石水左右。尹图南把缸拿回家去,倒上水养了几尾红鱼。一年过去,缸里的水仍然清澈如初。后来,这缸被仆人们搬动石块时失手打碎了。奇怪的是缸里的水像凝固了一样,也

不流泻出来。在物质三态上再发奇想,再打高论,增益着奇异性、突破性、不可思议性、人间与非人间性。如果人生追求是高官硕儒,蒲松龄此生一无所成;如果说他是非儒家的怪力乱神幻想家文学家,他则高居榜首。甚至是只此一家,别无分号。再看看,好像缸仍然存在,仍在那里,用手一摸却空空软软的。这个感觉珍贵动人,一切的存在都是可以破坏、软化与消失的,同时由于它们确实曾经存在而在感觉与记忆中存在恒久,伟哉存在,伟哉灭亡,既存即灭,已灭犹存,万年的存在迟早消逝,瞬间的存在,也可能永恒。只要伸手进去,水就随着手流出来;拿出手,水又合拢。到了寒冬,水也不结冰。一次,这缸水结成水晶状,但红鱼依然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动。尹图南恐怕别人知道这件奇珍,总是把它藏在密室里,除了儿子、女婿这样的亲人,从不拿出给人看。但时间长了,还是传了出去,要求观看的人纷纷登门,络绎不绝。

到了腊月的一夜,水晶化解为水,流了一地,红鱼也不见了。原来碎缸的残片还在。忽然来了个道士,登门索要碎缸片。尹图南拿出一片让他看,道士说:“这是龙宫中盛水的器具。”尹图南又描述了缸破后水不流泻的情景,道士说:“贮水的是缸的魂魄。”人有人魂,物有物魂,万物有尸有迹有灵有力,有品有性。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德余破缸魂。道士说完,很真切地恳求给一小块碎缸片。尹图南问他有什么用,道士说:“把它捣为碎末入药,能使人长生不老。”尹图南给了他一片,道士非常感谢,欢欢喜喜地走了。

秀才所用物品来自龙宫,那么秀才是龙宫鱼豚龟鳖精类下凡了。在科举中一败涂地的蒲松龄,终于写出了个孤独避世的个人乐生主义、独自享受美女小童、仙花神虹、美酒蝴蝶、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的高、上、小、微、自得其乐人物。

道士似乎是一个作者临时加上的人物,僧道职业宗教人。毕竟多一点人而通神的感觉,他不来,解说不了余德旧缸的龙宫宝物的特殊性,不露这个缸的不凡,也就不能显示出余德的龙宫超人类背景。连通仙界仙界龙宫的道士都要向尹图南求红片,余德的高阶便不须多言了,轻轻清清,高高飘飘,故事见好就收了也罢。

集印为诗

□侯军



赏菊

李贺忠(书画) 侯军(诗)

了。那段时间,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愉悦。

随着我的集印诗越作越多,陈浩率先提出了办展的动议。他还把自己刻的许多闲章提供给我,使我的词汇量大增。后来,我们又请书法篆刻家李贺忠“加盟”。于是,一个名为“集印为诗”的三人书法篆刻主题展在深圳艺廊推出,时间是在2013年11月20日。

深圳首展引起了各方关注和热评,其热烈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,很快就有各地邀展的信息传来了。于是,我们决定在深圳首展的基础上,策划一次横跨南北的巡展,让“集印诗”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与更多的朋友见面。2014年我们再度出发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《集印为诗》先后在五城展展,诸多艺术界人士对这种前所未见的艺术形式,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

中国古代有一种诗歌的做法,叫作“集句诗”。简单说来,就是用前人现成的诗句,组合成自己的诗作。比如说,文天祥在狱中,作过集杜诗500句,活用杜甫的诗句,重组自己的诗作,表达自己的感慨和悲怀。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也喜欢在自己的戏剧中运用集句诗,他的剧作几乎每一场的定场诗都是集句而成。可见,集句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渊源深厚传承有序的一门特殊艺术。

而集印诗词,与前人的集句诗可谓异曲同工。其共同点就在一个“集”字,都是在已有的诗文词句基础上的再创作,只不过一个是集纸上之诗句,一个是集石上之印文。然而两者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而言,又是判然有别的:一是材料不同,印章是刻在石头上的,相比于卷帙浩繁的前人诗文成句,印章属于资源匮乏的物质,这使创作集印诗词极度受限;二是文辞形态不同,印文大部分并非现成诗句,它的文学词汇的单位更小,绝大多数只是四个字的成语,还有一字、两字、三字的单词。当然,也有一些是五言七言的成句,还有少量的八九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多字印。印章的语言单位,也就是作诗的“零配件”要比集句诗小得多,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如果说诗就是建造一栋房子,那集句诗的建筑材料就是现成的预制板,而集印诗的建筑材料是零碎的零砖碎瓦。因此,其重组和串联就愈发困难,更何况要自抒胸臆了。

天津学者王振良教授在评论集印诗词时,有一个很有深度的论点,他认为集印诗词的出现,终于把诗和印这两者连接起来了。在中国的传统文苑里,诗书印画是“四位一体”的。而这四门艺术在中国文化的传承演进中,大部分已然融合在一起了——比如苏东坡讲到王维的画,说他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。就是说,诗和画早已融合了;书法和篆刻的“合体”也早就实现了,很多书法家就是篆刻家,篆刻家也必善书法。书法写在石头上,刻成印章,篆刻与书法也就浑然一体了,而印章盖在书法上,成为画龙点睛的“一点红”,书法和印章也就水乳交融了;至于画与印的融合,也是古已有之,画家早就习惯于在绘画作品上加盖印章,画印两者也早就密不可分。唯独诗和印,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线一直没有打通。很多人把现成的诗句刻成印,那是先有诗,后有印,印是被动的,他是按照别人的句子来刻,属于拼合,而非融合。而集印诗则是先有印,后有诗,诗是由印文重新组合而成的,抒发的也是此时此刻作者个人的情感。由此观之,集印诗词的创生,其意义不仅限于一种新的文字游戏,而是弥补上中国传统艺术融合中的一个“缺环”,使诗词和篆刻这两种古老的艺术形式,以一种崭新的呈现方式,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新的融合。这或许会为诗与印的创作者们,拓展出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理念。当然,这个“新玩法”还是刚刚破题,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天地,留待更多有志于此的朋友们以各自的实践来探索来开拓。

《江花》与“钢铁诗人”董宏量

□程琳

乙巳小雪,阳光依然灿烂,钢城青山却笼罩着阵阵寒意,钢铁诗人董宏量在这里作别人间,“我如雁字归去,思念是那长河”。苍穹之上,诗魂仿佛还未走远;苍穹之下,悲伤的脸颊已是河水蜿蜒。

从18岁那年踏上这块因不熄的炉火而发烫的土地开始,他就扎根青山,与钢铁一起呼吸,一起茁壮,一起沧桑。他从最艰苦的修炉工干起,以冰水浇透的草袋为护身的铠甲,以活字般的耐火砖为护炉的盾牌,立铜墙铁壁,为铁流开路粗粝的劳动,没有磨损他的感官,反而使它们更加敏锐,他的诗才在火泥里发芽,在炉膛中抽穗,随铁水而扬花。工地黑板报上的一首鼓动诗,不知被谁投给了长江日报《江花》副刊,从此“钢铁诗人”声名鹊起,纵横诗坛。

这首发表在江花上的现代诗,题为《摆开巨杯接红酒》,以瑰丽的想象描绘了高炉出铁的情景:一只只阔口深腰的铁水罐宛如巨杯,炽热的铁水宛如醉人的红酒,飞溅的火星宛如飘香的酒沫。这一年是1973年,“钢铁诗人”年方二十,风华正茂。这一次《江花》与钢铁的“偶遇”,于钢铁文学非同寻常的意义,将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光轴上一一显影。

作为一个与《江花》和钢铁都深有渊源的人,我深知那一次它们的相遇是如何梦幻,又开启了怎样的传奇。但这里我不想一叙说,只想讲几件自己亲历的与董宏量老师同时也与《江花》相连的往事,为人们了解这位钢铁诗人的不同侧面提供一点旁证。

2002年9月23日,长江日报《江花》副刊登出了一篇《钢城的门》的散文,“望着那通红通红的炉门,师傅唱起了歌谣:‘一炼钢啊二炼铁,三焦化啊四烧结,修炉工的门火最烈……’歌声沙哑而深沉,使我绷紧的肌肉渐渐放松,汗水舒畅地流淌,也使我心中涌动着诗情。于是,我放下沉重的钢钎时,便拿起了轻盈的诗笔。钢城的另一扇门——文学之门,就这样向我悄然敞开”,作者正是董宏量。

紧随《钢城的门》,是“诗歌三人行”,三个武钢人,王江汉、程琳、贾汉猛,跟在“钢铁诗人”后面集体亮相。三个人的诗,都是他从《武钢文艺》来稿中挑选的,事前未曾透露半字。恰如《钢城的门》中所言:“我已在钢城工作了三十个春秋,做得最多的事,竟是不断地把一个又一个朋友引进这里的文学之门来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策划这次“武钢职工作品展”的《江花》编辑罗时汉,原也是武钢人,还是董宏量《武钢文艺》编辑部的同事。两人一样才华横溢,却性格迥异。虽然一个刚猛如英雄,一个温润如灵玉,并未影响彼此尊重、英杰相惜。

罗时汉在长江日报社几经腾挪,终于当上《江花》的编辑,回到魂牵梦萦的文学家园。1998年春,《江花》头条推出一篇《为岩石感动》的散文,作者是武钢耐火材料公司一个叫“程琳”的工人。当时,这个位置基本上都是名家大家。发稿之前,罗老师曾打电话给《武钢文艺》主编室和武钢耐火材料公司,向董老师与他的挚友、诗人刘天华求证,首先要搞清楚作者是否具备那样的能力,以免闹出乌龙。

“放心大胆地发。”董老师告诉他,《武钢文艺》也要发我一个头条,是一篇小说。我何其有幸,正是这些贵人的提携,使我从未放弃梦想,即使时光荏苒,物是人非,始终逐梦而行。

2023年5月,董老师病中要我与罗老师、小隋陪他去武钢厂前铁路上单身宿舍“寻根”。两位老师都曾任铁路山住过不少年头,火热的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,他们一起在那里纵论文学、社会与人生,书写钢铁的光荣与梦想,孕育深长的思考 and 蝶变佳的佳构,曾一起登上单身食堂打饭,来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偶尔也举杯畅饮。一些记忆从大雾中浮现,两人的话越聊越投机。

他们共同抚摸着棵儿人抱的悬铃木。

“寻到根了吗?”罗老师问。

“我的根在炼铁的高炉,出钢的平炉。”就是这次寻根之旅,由罗老师提议,敲定了在武钢一号高炉举行董宏量创作五十周年回眸暨《六色谱》首发式。其时武钢一号高炉已永远退役并入选国家工业遗产。2022年初,我曾陪董老师与他的夫人孙曼萍旧地重游,钢铁诗人抚今忆昔,感慨万千,指着国家工业遗址公园的铭牌即兴赋诗:“我是一个工业遗址啊/虽然白发苍苍/但对钢铁的爱一点也没有减少!”

“……哦,钢城/我的钢城/我就是这样/为你燃烧,为你盛开/为你冷却又为你沸腾/成为你的一团炉火一朵铁花/一块浇铸成型的钢锭啊/你该知道,你该知道/我的热流为谁而流/我的白发为谁而生!”这首《致钢城》发表于2023年11月2日长江日报《江花》周刊,正值董宏量创作五十周年回眸暨《六色谱》首发式,那日,长江日报社社前记者,《江花》副刊前编辑罗时汉现场采访了董宏量。

“当年你‘摆开巨杯接红酒’,接的是一号高炉的铁水?还是哪座平炉的钢水?”“都是。”

“它溅起了江花,日出江花红胜火!”彼时的钢铁诗人欲言还休,表情凝重,既有欣慰,亦含忧伤。而今,我分明听见他说:“有日出就有日落,每个人都有谢幕之时。唯有钢铁扎根青山,根脉不朽;唯有长江万古诗情,一路生花。”